



我们的 总设计师

我们的总设计师

苏光明 宋建民 主编

人民出版社

我们的总设计师

Women de Zongshejishi

主编/苏光明 宋建民

责任编辑/王开基

封面画/李琦

出版发行/人民出版社

社址: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100706

印刷/北京印刷三厂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6 字数120,000

版次/1993年5月第1版 1993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8,000

ISBN 7-01-001236-9/D·420 定价:4.00元

主 编：苏光明 宋建民

编写成员：过生如 李德山 袁 伟 杨建英

徐晓溪 穆利华 柏万良 任献忠

武翠英 宋国斌 赵红英 侯建中

方素兰 徐 立 王 钢 唐 杰

张建国 赵京伟

目 录

一、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1
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建设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	23
三、经济建设中心论	32
四、改革动力论	47
五、对外开放论	65
六、市场经济论	84
七、经济发展战略论	99
八、政治稳定论	115
九、和平外交论	126
十、如何理解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 “左”的科学论断	143
十一、学习邓小平	153

一、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以非凡的革命胆略，严格的求实精神，为中国人民实现四个现代化探索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开始了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使古老的中国发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历史性变化。

邓小平同志坚持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同志和他倡导的改革开放，使社会主义中国充满了生机和活力，从而赢得了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并受到国际舆论的一致好评。而邓小平同志这种无私无畏、追求真理的务实精神正是来自他那不平凡的经历。

(一)“打不倒的小个子”

1904年8月22日，邓希贤（即邓小平，此名系1927年在武汉从事地下工作时使用的化名，后一直沿用至今）出生在四川省广安县姚坪县（今协兴乡牌坊村）一个富裕的农家。其父

邓绍昌(又名邓文明)从小受到良好教育,清末就学于成都政法学校,以后长期在外谋事。根据1969年海外出版的《共产党中国名人录》的记载,邓绍昌曾是哥老会的成员,并且充任这个组织的“旗手”职务。哥老会是清末影响最大、分布最广的秘密结社,当时清王朝已摇摇欲坠,平民百姓生活困苦,在那个年代,加入哥老会这样的秘密结社可以互济互卫,权且作为一个避难地罢了。

邓小平的生母淡氏出生于四川省广安县恒升乡一个较富有的家庭。她是家中长女,从小受到中国传统的良好家教,勤劳贤惠。由于邓小平的父亲长期在外谋事,因此家中之事便由邓小平的祖母戴氏和母亲淡氏操持。戴氏和淡氏严于家教,要求子孙学圣、修身、治家、清廉。然而邓小平最终却未进入仕林。不久,戴氏和淡氏相继辞世。邓小平的父亲又续娶了嘉陵江支江涪江船工的女儿夏伯根。夏氏终身目不识丁,但却具有中国妇女的传统美德——勤劳、善良、朴实、正直。周围的人都亲热地称她为“夏伯娘”。

邓绍昌有四男三女,邓小平是长子。邓小平6岁进私塾读书,因其聪明、伶俐,颇得私塾先生的喜欢。据邓小平的舅父淡以兴回忆当年他和邓小平的孩提生活时曾说:“幼年时,我和小平一起上学念书,我太笨,他很聪明,每回考试他都名列前茅。因此,大家都选小平当学生代表,受到老师的表扬。但我姐夫和姐姐对小平要求甚严,向老师提出‘不要小平当代表,表扬多了就会骄傲’。”8岁时的邓小平,以他的聪敏、胆大已成了“娃娃头”。

1918年,14岁的邓小平考入广安县中学堂。第二年五四

运动爆发，学校为响应五四运动，也举行了罢课，暑假将至，邓小平和其他学生一样，离开学校，回到家中。恰巧父亲也从重庆回来，并带来了重庆成立留法勤工俭学重庆分会，准备开设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的消息。邓绍昌主张儿子去报考该校，去法国勤工俭学。香港有一本书对邓小平去重庆求学的经过作了如下描述：

当父亲告诉儿子准备送他去报考法语预备学校时，邓小平起初表示不愿意。父亲很生气，训斥说：“格老子！你为啥子不去看看，那些懂几个鸡肠字的洋先生，多威风神气！连我这个‘大哥’也要尊他们一声‘先生’呢！你去了，学得好回来，老子甘愿喊你做‘先生’，学不好，那就是‘笨蛋’！”听了父亲的这番话，倔强的邓小平转身就走，收拾好包袱，第二天一早就带着父亲给的30块大洋，跑到重庆，报考了那所留法预备学校。临走时，他只对母亲说了一句话：“我要做先生，不做笨蛋。”

1920年10月，圆圆的面庞、蓄着背梳的长发的邓小平登上了去往法国的“盎特莱蓬”号海轮。那年他才16岁，是同船前往法国的88名中国人中个子最矮且年纪最轻的一个。

在工作和学习两项任务中，“盎特莱蓬”号轮船的旅客首先完成的是第一项。后来，邓小平在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也说，在那些年月里，他并没有上学，而是在工厂干活。法国警察局的表格和工厂的工人名单记载着邓小平留学法国的活动踪迹。

1921年春，邓小平在布列塔尼的贝页中学的语言进修班。后来，他到巴黎附近的工厂做工，住在拉加朗——科隆伯城。

1922年2月，他又到离首都百公里的蒙塔尔吉当体力工人。同年秋天，在第戎附近的小镇夏蒂絮尔赛纳入夏蒂荣中学学习。不久后又返回蒙塔尔吉。

1923年2月，他成为赫金森橡胶厂的雇员。6月，又迁居到拉加朗——科隆伯，在比扬古雷诺汽车厂做工，直至他离开法国。

据说，在法国勤工俭学期间，为了节约，邓小平还为他的同伴做饭。也是在法国，他学会了打桥牌，这一爱好伴随他的一生。“文革期间”这一爱好则成了他的一条政治罪状。

在法国勤工俭学的中国青年们当时条件十分艰苦，他们领到的微薄补助金不够生活开支，多数人因此只能在首都以外的学校学习语言，而没有相应的语言和专业知识，只能得到工资低微的工作。所以，大多数人都集中在几个外地学校和巴黎附近的工厂里，包括雇用中国人的雷诺汽车厂。青年们发扬中国人的互助互济传统，成立了一些华人团体，不少小公寓里住的全是中国人，这给他们彼此之间的联系以及日后组织活动带来了方便。

邓小平最早通过“工学互助社”开始参加革命活动，互助社是由蔡和森、王若飞创建，他们在社内张贴《共产党宣言》中文稿，号召大家学习苏联工人阶级的榜样。1921年，“工学互助社”改名为“工学联合会”，有400名会员。其中一部分人同年成立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1922年，邓小平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加入中共法国支部。中共法国支部是中共欧洲支部的一部分，周恩来当时是中共欧洲支部的领导人。在青年团，邓

小平负责该组织的机关报《少年》的刻板、油印工作。后来，因原负责主编《少年》的赵世炎被派往苏联，便由周恩来接手，易名为《赤光半月刊》。1924年周恩来特地将邓小平从蒙达尔尼区调到巴黎，与陈延年一起共同负责《赤光》的编辑出版工作，油印工作由邓小平负责。邓小平为此还得了个“油印博士”的绰号。

在法国期间，邓小平还参加过1921年的里昂工学运动。根据中法两国政府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达成的协议，法国利用义和团运动失败后向中国索要的赔款，在里昂建立了中法大学。大学由两国政府共同在中国招生。但事实上，这所大学却排斥中国学生，蔡和森、李立三、周恩来、李维汉、陈毅等先期抵达法国的勤工俭学青年得知他们被排除在该大学之外后，立即向校方交涉，要求这所新办的大学向全体留法的中国学生开放。一百多名中国留法学生参加了这次抗议行动。校方拒绝了中国学生的要求，致使抗议行动升级。学生涌上街头演讲、向市民散发传单。最后，里昂当局出动警察，把一百多名参加抗议示威行动的学生抓进兵营，在拘禁三周后驱逐出境。当时邓小平、周恩来从他们做工的工厂领了工作证，对警察说，他们是工人，不是学生，才得以继续留在法国。

1926年1月，邓小平由于受到法国政府的监视、迫害，与傅钟、任卓宣由巴黎经柏林，来到莫斯科，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被同学称为“小钢炮”（指他的身材以及善于辩论的口才）的邓小平在莫斯科呆了近一年。我们没有直接材料说明他学习什么课程，但他很关心校内国民党派去的学生和共产党人

进行的辩论(其中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与国民党的合作)。(参见匈牙利巴拉奇·代内什著：《邓小平》，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5月版，第50页)

邓小平在中山大学学习时曾担任一个班的团小组长，蒋经国也被编在这个小组。当时蒋经国只有15岁，身高仅才1.51米多一点，是全校数百名学生中年纪、个头最小，也最活泼的一个。蒋经国说一口浙江话，走起路来蹦蹦跳跳，爱说爱笑爱唱，整天无忧无虑。因为他经常穿一件夹克式工人服，戴着鸭舌帽，皮肤又晒得黑黑的，像个小童工，所以大家都开玩笑地叫他“Рабочий”(俄语“工人”)。

邓小平虽然比蒋经国大6岁，但个子也不高，站队时他们俩老站在一起。邓小平富有组织才能和表达才能，见多识广，爽朗活泼，再加上又是蒋经国的组长，所以蒋经国对邓小平很尊重，把邓小平看成是“大哥”、“学长”。后来，80多岁的邓小平回忆说，蒋经国“学得不错”。历史就是这样地和人开玩笑，谁能想到昔日的同窗学友和同志日后竟会成为海峡两岸的风云人物？

1926年底，邓小平从莫斯科动身，1927年3月到达西安。当时国内国共两党的合作已名存实亡，党中央派他到冯玉祥的中山军政学校去工作。这所学校隶属于冯玉祥的国民联军总部，实际上是由刘伯坚等几位共产党人筹建的。邓小平任这所学校的政治处长兼政治教官，并任该校的中共党组织书记。邓小平在这所军校亲自讲授马列主义原理和中国共产党基本纲领，培养出了一批有革命觉悟的初级军官和党政工作干部，并向国民联军驻陕西总司令部政治保卫队输送了一批毕业

生，逐步组建了一支由中国共产党掌握的武装力量，从而为后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西渭华起义创造了条件。'

1927年，上海、长沙等地先后发生反革命叛变，冯玉祥也对其部队中的共产党员实行“礼送出境”。鉴于此情况，1927年6月，邓小平根据党的安排，离开西安转赴汉口的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为嘉许他在中山军政学校工作期间的业绩，任命他为中共中央秘书。不久，武汉也发生反革命政变，白色恐怖笼罩着全国，中国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这时，为秘密工作的需要，邓小平这个名字取代了过去的那个邓希贤。

1927年“八七”会议后，邓小平随中共中央机关秘密前往上海，23岁的邓小平担任了中共中央秘书长，主管中共中央机关的文书、机要、交通、财务等工作。

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桂系战败退出广西，俞作柏、李明瑞回广西，分别担任广西省政府主席和广西省绥靖司令。俞、李二人策划反蒋，并表示愿与共产党合作，要求共产党派干部去他们的部队工作。于是，年仅25岁的邓小平作为中共中央的代表，被派往广西领导当地党的工作。

当年7月初，邓小平到达南宁，随即改名为邓斌。他经过多方面的工作和准备，于1929年12月11日举行了百色起义，并成立中国红军第七军，邓小平为政委，张云逸为军长。邓小平和红七军在右江根据地战斗了整整一年，使根据地和军队不断得到发展壮大。

1930年2月，邓小平又来到龙州。2月1日，宣布起义开始和红八军成立。邓小平兼任红八军政委。不久，中共中央为加强红七军、红八军的统一领导，又任命邓小平为红七军、

红八军的总政委，李明瑞为红七军、红八军的总指挥。

1931年初，邓小平历尽艰险来到上海，向党中央报了到。而后，他又被派往以江西南部 and 福建西部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担任瑞金县委书记。这期间，他结识了一位很有才干的瑞金县的党的干部金维映，并与她结了婚。

在邓小平任瑞金县委书记期间，由于这里过去曾一度被国民党攻占，1931年春收复后又受肃反扩大化的影响，土地荒芜，群众粮食非常紧张，加上国民党军队对根据地的不断“围剿”，红军给养也十分困难。为了支援革命战争，邓小平带头节衣缩食。他和大家吃的一样，每顿一个菜；他和大家穿的一个样，粗衣棉布的中山装，一条深灰色的哗叽裤子，裤脚破了三次，他让妻子把毛了边的裤脚卷到里面，贴上一块布再缝好也缝了三次，裤子越缝越短，可他照样穿着它会客和出席会议，尽管裤子已磨得发亮，但因为没有补丁，所以一直是他的外出正式场合的服装，平时还舍不得穿呢。

还有一个关于毛巾的故事，也足以反映出邓小平带领大家厉行节约的苦心。那时，邓小平有一条用了好几年的花格毛巾。毛巾虽很旧，但却完整无损。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好生奇怪：这里边有什么窍门吗？一次，邓小平正洗脸，大家便留心观察，发现他不是拧毛巾，而是用两手挤毛巾，大家觉得新鲜，不解地问邓小平为什么毛巾不是拧干而是挤干？邓小平笑着回答大家：“你们想想看，毛巾是线织成的，拧来拧去线很容易拧断，用手挤，就要好一些。”又说：“这是我从实践中摸索出来的。不信你们试试看，准能延长毛巾使用寿命。”大家按着邓小平的说法去做，果然很见效。（参见张世明等著：《邓小平珍闻

录》，知识出版社1993年1月版，第43页）

邓小平担任瑞金县委书记后，迅速为前一时期的蒙受过冤屈的干部和群众平反，召开了全县苏维埃代表大会，广大群众的积极性提高了，局面大为改观。

1932年5月，邓小平调任中共会昌县委书记。同年7月，会（昌）寻（乌）安（远）中心县委成立，邓小平担任中心县委书记兼第三作战分区政委。

1933年3月，邓小平离开了会寻安中心县委，调任江西省委宣传部部长。就在这个时候，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中共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两个月后，邓小平被作为“江西罗明路线”的主要代表，受到错误的批判和打击。邓小平受打击的根本原因是他和“左”倾领导者之间存在的原则分歧，直接导火线即所谓的“寻乌事件”。

1932年11月，广东军阀陈济棠乘红一方面军主力在北线发动建（宁）黎（川）泰（宁）战役，南部苏区力量空虚之机，突然向会、寻、安三县大举进攻。大敌当前，军情十万火急。当时任会寻安中心县委书记的邓小平，根据敌强我弱、力量悬殊的情况，领导苏区人民坚壁清野，以灵活的游击战术阻击敌人的进攻，可是，毕竟敌众我寡，敌人很快占领了包括寻乌城在内的几乎整个寻乌县。这就是所谓的“寻乌事件”。邓小平被扣上“在敌人面前惊惶失措，准备退却逃跑”，“纯粹防御路线”等等帽子。

1933年4月16日，江西省委在苏区中央局的直接参与下召开了为期五天的江西党组织3个月工作总结会议，反“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开始在江西苏区全面展开。会议指责邓

(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是“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是“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的领袖”，会议集中“布尔什维克的斗争火力”，对邓小平等人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并严格要求将这一斗争“转变到实际工作中去”。

邓小平被撤销了江西省委宣传部部长的职务，并被送到红军总政治部驻地瑞金隔离审查。邓小平坚持真理，不肯妥协。在他政治上承受着巨大压力的时候，感情上的打击也接踵而来。妻子金维映忍受不了被人歧视的痛苦，向邓小平提出离婚。邓小平凭着惊人的意志力，承受住了这精神上、感情上的双重残酷打击，他没有消沉，反而更加坚强。

最后，邓小平受到党内严重警告的处分，被派往边远的乐安县属的南村区委当巡视员。然而，不到10天，他又被押送回瑞金等候处理，这时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在病中得知了邓小平的处境，便指名把邓小平调到总政治部担任秘书长工作。后又改任总政治部宣传干事，兼主编总政机关报《红星报》。

从1931年夏开始，到1933年8月前后这一段时间，是邓小平一生中“三起三落”的第一次。

抗日战争爆发后，邓小平先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不久，又调任129师政治委员，与师长刘伯承一起并肩战斗长达13年，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1951年，他们才恋恋不舍地分了手。从晋冀鲁豫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到第二野战军，邓小平和刘伯承的名字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人们习惯地把他们称为“刘邓”，把他们领导下的部队称为“刘邓大军”。刘邓大军为开辟晋冀鲁豫敌后抗日根

据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做出了重要贡献。抗战胜利时，刘邓领导的晋冀鲁豫解放区已控制了 80 多座城市，拥有 2,400 万人口，军队发展到 30 余万人。

解放战争时期，刘邓大军参与了多次战役，尤其是“千里跃进大别山”和三大战役之一的淮海战役，已是家喻户晓、有口皆碑。

1951 年，在完成了进军大西南，和平解放西藏的光荣任务后，邓小平奉调回北京，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协助周总理处理全国事务。在党的“八大”一次会议上，他又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总书记。

在建国后近 10 年的时间，邓小平一直处在第一线协助党的主席、副主席处理日常工作，参与党和国家的重要决策，在加强执政党的自身建设、整顿工业企业、改善企业管理、实行职工代表大会制等方面提出了重要的正确的主张。

然而，1966 年毛泽东亲自领导和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使邓小平经历了他一生中的第二次沉浮，这也是他革命生涯中最艰难、最曲折的时期。

1966 年 8 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发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随后，刘少奇和邓小平开始受到错误的批判和斗争。担任总书记的邓小平被戴上了“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国的第二号修正主义分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总根子”等帽子，第二次被打倒。1968 年 10 月 13 日至 31 日召开的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了决定，将刘少奇开除出党，撤销邓小平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1969 年 10 月，林彪为篡党夺权，乘中苏边境局势紧张，

签署了“一号命令”，要全军处于随时出击的一级战斗状态，首都实行“战备疏散”。在这个命令下，邓小平等一大批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在一天内被分别遣散到河南、广东、江西、安徽、江苏、云南等省，由当地省军区负责监护，实际上是进行各种政治迫害和肉体摧残。邓小平被押送到江西省新建县，在那里度过了3个艰难的春秋。

1971年9月13日，林彪反党集团自我爆炸。邓小平奋笔疾书，给毛泽东写了一封4000余字的长信，信中表达了他愿意为祖国和人民的事业重新工作的强烈愿望。他说：完全脱离工作脱离社会接触已经6年多了，……我觉得自己身体还好，虽然已经68岁了，还可以做一些技术性的工作（如调查研究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做七八年的工作，我没有别的要求，我静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参见宗峻：《总设计师》，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1月版，第367页）

1973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会议，一致通过了恢复邓小平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决定。1974年，邓小平代表中国政府在联大第六届特别会议上发言，系统地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论断。周恩来因病住院后，邓小平从1975年1月开始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主持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

邓小平从1月5日复职到10月4日，短短八九个月的时间里，对党风、军队、工业、交通以及农业各个方面的整顿，都作了极富针对性的论述和部署，仅公开发表的正式讲话就有八、九次之多。而当时“四人帮”尚在横行，邓小平是横下一